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Prema-chandra Athukorala　Kyoji Fukao　袁堂军

一　导言

过去 30 年，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而这主要归功于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二是劳动力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超过 1 亿人离开乡村到城市工作——这是历史上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现象。[①] 此外，国营企业的改革也使4000 多万劳动力流向私营部门。“由过剩劳动力支撑的比较容易的经济转型阶段是否即将迅速接近尾声?”近年来中国政界对此越来越关注（Garnaut 和 Huang，2006；Hausmann 等，2006；Siebert，2007；Islam 和 Yokoda，2006）。而政界如此关注，也是因为根据中国官方的工资数据显示，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增幅显著；而在业界媒体的报道中，在发展迅速的沿海省份出现劳动力紧缺的个案。在本文中，我们会通过考察过去 30 年中国在持续的结构性变化及劳动力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的就业和工资趋势，来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有大量关于改革时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文献。[②] 不过，绝大多数现有研究反复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微观方面。这类研究只是孤立地考察一个具体问题（例如，相比于城市永久居民，农民工的薪酬是否很低），并做出政策推论。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所讨论的问题是转型期

① 文中提到的数据，除非特别说明，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各年度报告）。

② Zhao（2005）一文对截至 2003 年的相关文献作了广泛的调研。Shi 和 Sato（2006）一文也提供了相关文献的列表，可以找到最近的相关论文。

经济持续增长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结构性现象。这种情况在这类文献中并不少见。很少有哪一部文献尝试针对不断发展的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并研究其对未来发展轨迹和对国家发展政策的影响。填补这一文献空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政策，对国家的发展过程和人民福祉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劳动力过剩的状况迅速走向终结，那么很显然，国家需要进一步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加快技术进步，来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作准备。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状况与现有数据显示的情况相反，即劳动力过剩的状况一直持续下去的话，该方向的政策转变可能与实现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目标相违背。除了与中国的国家发展政策相关之外，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势进行系统分析对于讨论中国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担当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的。

该研究的分析框架是依据著名的刘易斯模型，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情况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下简称“刘易斯模型”）（Lewis，1954，1958，1979）。在分析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进程（例如，Minami，1973，1986；Fields，1994；Ranis 和 Fei，1975；Ranis，1993）时，该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被适当修改。该模型以一个封闭的二元经济的假设开始，即一个“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一个以过剩劳动力为特征的“生存”（传统）部门。[①] 在现代部门，正如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实行的是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劳动力生产的边际产出价值来支付其报酬。按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在自然经济中，工资率按照惯例是由当地维持生计的水平决定的。因为与传统部门相比，生活在现代经济中的生活成本更高，所以现代经济部门可以按照固定工资率雇用工人，即付给他们的报酬会略高于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费用。按照这样的工资率，现代部门在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之后，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不再会抬高工资，而是增加国家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假定存在一些“扰动”，例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正如中国的经济体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发生的转变一样）可以提高工业效率的技术变化，可以引发现代部门在生产上的扩张。随着产量的不断提高，利润也在稳步增长，而工资水平却保持不变，这就导致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增加。该增长过程作为一个正向的反馈过程不断继续——利润增加，利润再投

① 在刘易斯模型的许多应用中，“生存部门”近似于“农业”。这一术语会造成误解，它忽略了小规模非农产业和非正规部门中的失业者和就业不足者，他们也是劳动力储备的一部分。

资，进一步的工业扩张和进一步的扩大雇用规模——直到传统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完全被现代部门所吸收，从而到达著名的“刘易斯转折点”。自此以后，两个部门的工资开始趋于同一水平线，而经济看起来已经非常像工业化经济了。在达到转折点以后，二元经济结构随之消失，生存部门变成了现代经济部门的一部分，工资率和人均收入沿着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持续上升。

该模型可以被应用到国际领域而无需改变其基本结构（Kindleberger，1967；Ranis 和 Fei，1975；Lewis，1979）。对要素禀赋和相对要素价格的新古典主义式的反应可以在开放型经济环境中看到。对于过剩劳动力经济，这意味着有更多的通过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出口来扩大产量的机会。现代的工业技术、低廉的工资和高度灵活的劳动供应，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带来了高利润率，而高利润率又通过资本积累的增加而转化成了高增长率。高收益率同时也吸引了外资的加盟，从而加快实现了经济的转型增长。在达到转折点后，国内企业为了寻找廉价劳动力将走出国门，它们将引进廉价的移民劳工或将工厂迁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低廉的国家。

我们简略地概括一下有关刘易斯模型的一些限制条件（Rosenzweig，1988）。经常有人指出，“二元经济”的假设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不切实际。这样说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往往是很分散的。另一种批评是，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真实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自然经济中劳动力供应的高度灵活性的假设是不相符的。这些对模型的微观基础的质疑不足以对我们造成困扰。刘易斯模型的用途，以及我们在此应用这个模型的目的，就是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劳动力供应在经济转型阶段的作用。在研究动态的转型增长时，独特的二元结构和灵活的劳动力供应假设，仅仅是为了方便分析。如果经济是“分散独立的，不论有多少个组成部分，那么二元论就是让其简化的假设”（Basu，1997：152）。至于劳动力供给的伸缩性，“我们不需要‘无限的’伸缩性；‘非常大’就足以满足我们的用途”（Lewis，1979：218）。

因为缺乏许多关键的变量数据，再加上现有数据的质量低劣，就妨碍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环境进行系统的定量评估。例如，没有现成可用的数据显示工人的技术成分，农业工人和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情况，以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就业状况，而这些数据对于系统地分析经济环境中存在过剩劳动力供给是很重要的。同时，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也很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统计系统在指令性经济条件下的弊病。主要的局限在于：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过多地关注了城市产业工人，而对于工作在城市管辖范围之外

的数目更为庞大的制造业员工则缺乏详细的数据。即使在城市，数据的收集和报道也集中在迅速衰退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生产企业，对于充满活力且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私营制造业（Banister，2005a，2005b）缺少足够的关注。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比如中国经济体制的复杂性）以及经济数据被赋予过多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在省和地方各级政府（Rawski 和 Xiao，2001）。

我们的目标是，从政策讨论的视角，对最近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进行更为广泛的探索性分析，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寻求新的途径。本文的核心内容是，使用现成的官方数据，仔细分析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环境及工资趋势，同时要注意这些数据的局限性，使用从最近的家庭调查中获取的原始数据对工资确定过程进行经济计量分析。与此相关，我们还利用现有的微观经济文献，来确定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键方面，因为这些方面与过剩需求状况研究有联系。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概述了初始劳动力市场情况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关键要素，为随后的分析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我们对改革时期的劳动力供应状况和就业模式进行了考察，并重点关注了过剩劳动力情况的转变。第四部分，我们对急速上涨的城市总体工资水平和繁荣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之间明显的不一致性进行了调查。第五部分，我们总结了主要成果和政策推论。

二　初始劳动力市场状况、劳动力市场改革及劳动力转移

在推行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在经过了 40 年的发展演变之后，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①]结构的例子（Eckstein，1977；Putterman，1992）。政府严格控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业和小规模的乡村工业领域。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中国的城市和工业中心存在大量的显性失业现象，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现象。甚至是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为迅速的 20 世纪 50 年代，如上所述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依然存在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因此，中国的状况与俄罗

① 通过组织架构的改革，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和更小的投资获得大体上相同水平的产出时，可以认为存在劳动力过剩。

斯不同，在中国没有必要动用农村的劳动力“储备”。此外，国家为了保护城市人口的利益，设置了许多城乡移民障碍。在 20 世纪 50 年代，政府建立了户籍制，人们被限制在其出生的城市或乡村里，以此来确保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同时确保工业和城市部门有足够的粮食供给（Cheng 和 Selden，1994）。户籍制的建立，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完全分割开了，劳动力被指定分配给其所在的工作地点。此外，限额配给变得越来越普遍，只有迁移得到批准的人们才能在迁居地获得新的住房。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逐步放宽了国内移民的政策限制（Meng，2000；Tao，2006）。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支配自己劳动的自主权，他们可以配置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来从事非农业活动。与此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源的严格控制。1983 年，政府准许农民将他们的农副产品运输、销售到外地市场；政府还批准建立农村合作社及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这些举措都为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些发展迅速的乡镇企业（TVEs），很快就成为农民务工的首选之地。乡镇企业吸收了一大批劳动力，他们都是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解脱出来的农民（Garnaut 和 Ma，1996）。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改革深入到了城市部门，并建立了经济特区。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只要他们有能力养活自己。随后，政府还逐步取消了粮食配给/粮票制度，并且准许个人按市场价购买食品。这些政策的实施都为城乡移民提供了便利。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政府采用各项措施，以期进一步放宽户籍制度，同时还鼓励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Naughton，2007：第 8 章）。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多项措施鼓励城乡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一些城市实行一种选择性的移民政策，政府给那些投资在当地建企业或在城市购买昂贵住房的移民解决户籍。从 2001 年起，在大多数小城镇里，要获得当地户口的最低要求是，户籍申请人有长期的收入来源，并且在当地有合法的居住权。此外，房屋所有权限制的解除，就业政策的改变，限额配给制度的取消，以及城市欠发展区域的扩张，都为移民迁居城市提供了便利条件。城市住房商业化，城市私营部门的迅速扩张及连接城乡的移民网络的迅速发展，都为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了便利条件。

20 世纪 80 年代初，城市经济开始进行工资制度改革，在新实行的灵活的劳动力管理策略下，城市求职者可以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民营企业找工作。这个聘用系统的应用（国内闻名的“联合三个渠道就业”）标志着计

划经济时代的劳动力分配模式一去不返。在 1983 年推出的劳动合同制度为企业招聘短期合同工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大约在 1993 年，国有企业（SOE）传统的任用制度开始瓦解，同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被赋予了裁减冗员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就业安排方式，叫做下岗，或称做待业。根据该制度，工人即使不再到企业上班，但仍与企业保持联系，并有权领取小额津贴和福利（Rawski，2003：23）。

1994 年，政府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由于部分企业的私有化（主要是中小型规模的企业），亏损企业倒闭或被兼并，到 2005 年时，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已经从 10 年前的 30 万家下降到 15 万家（Bergsten 等，2006：23－24）。国有企业数量的锐减，再加上现有的国有企业的缩编改制，导致国有企业的就业率大幅下降。1995 年，有 1.13 亿人在国有企业工作，达到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的高峰，而到了 2005 年，国有企业员工仅有 0.65 亿人（Naughton，2007：第 8 章）。

总之，过去 20 年进行的经济改革，已逐步放宽了对中国经济各部门和各行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是，目前对城乡之间、正规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的流动仍有一些限制。因此，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是被高度分割的，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比如养老金、医疗保障和失业救济金的获取都与城市户籍身份密切相关。户口登记了一个人的特定的所在地和特定的身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唯有那些拥有城市居住许可证——俗称“城市户口”——的人才有权永久地生活在城市。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府大大放宽了户口申请的限制条件，尽管如此，户口制度依然是存在的，而且是否拥有城市户口仍然是有差别的。富人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以把户口从城镇或小城市迁移到大城市，然而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想申请到城市户口并不容易（Wu 和 Trieman，2004；Liang 和 Ma，2004；世界银行，2005）。虽然在过去的 15 年中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但是国有企业部门还是解决了将近 1/5 的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在这些部门里，有关就业和薪酬的做法与市场规律相距尚远。

三　劳动力供应和就业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中国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人口年均增长率从 1985 ~ 1995 年期间的 1.4% 下降到 1995 ~ 2007 年期间的

0.75%（表1）。中国目前有13.2亿人口，根据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来看，预计到2025年，中国人口将达到约15亿这样一个顶峰（Tao，2006：表8－2）。[①]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以及年轻人数量的增加速度超过了需要供养的儿童及老人的数量，劳动适龄人口（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的潜在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形成了所谓的

表1　中国人口统计表（1985～2005年）

年份	总人口(万)	劳动力		城市人口	
		总人数（万）	占总人口的比例(%)	总人数（万）	占总人口的比例(%)
1985	105851	50112	47.3	11882	23.7
1986	107507	51546	47.9	12639	24.5
1987	109300	53060	48.5	13435	25.3
1988	111026	54630	49.2	14100	25.8
1989	112704	55707	49.4	14601	26.2
1990	114333	65323	57.1	17252	26.4
1991	115823	66091	57.1	17805	26.9
1992	117171	66782	57.0	18338	27.5
1993	118517	67468	56.9	18884	28.0
1994	119850	68135	56.9	19425	28.5
1995	121121	68855	56.8	19995	29.0
1996	122389	69765	57.0	21264	30.5
1997	123626	70800	57.3	22592	31.9
1998	124761	72087	57.8	24041	33.4
1999	125786	72791	57.9	25317	34.8
2000	126743	73992	58.4	26800	36.2
2001	127627	74432	58.3	28031	37.7
2002	128453	75360	58.7	29458	39.1
2003	129227	76075	58.9	30833	40.5
2004	129988	76823	59.1	32081	41.8
2005	130756	77877	59.6	33479	43.0
2006	131448	78343	59.6	57706	43.9
2007	132129	78881	59.7	59379	44.9
备忘项目：平均年增长率(%)					
1985～1995	1.36	3.33		5.4	
1995～2007	0.75	1.13		4.3	
1985～2007	1.02	2.1		4.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① 基于中国人口信息中心的推测。

“人口红利”。劳动力的增长更快，从 1985 年的大约 5.01 亿人迅猛上涨到 2007 年的 7.89 亿人，这反映了劳动人口参与率在持续上升（从 72% 到 88%）。在 1995～2007 年期间，年均增长的劳动适龄人口为 1.1%，相较之下，全国总人口增长仅为 0.75%。预期到 2025 年，劳动适龄人口将从目前的 9.25 亿上升到 10.18 亿。

在中国，就业的扩大远跟不上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农村实现就业的总人数（假定其中有大量就业不足的工人，讨论见下文）在过去的 15 年里大致保持在 4.90 亿左右。在外资企业（包括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和当地私营企业（包括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这类城市经济中新兴的私营部门中的就业增加非常可观：1990 年，这些企业实现的就业总人数为 0.65 亿，而在 1990～2007 年期间，增加到近 1.82 亿（表 2）。相比之下，城市经济总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要慢得多——从 1.704 亿增加到 2.935 亿——这是国有企业部门大规模削减就业人员造成的后果。国有企业部门就业的总人数在持续下降——从 1990 年的 1.035 亿降到 2007 年的 0.642 亿。城市经济虽然在不断增长，但就业弹性（即 GDP 增长 1% 所对应的就业率的增加）仍然很低，在 1990～2001 年期间，就业弹性在 0.1～0.2 之间波动（Brooks 和 Tao，2003）。

表 2　劳动人口与就业状况

单位：百万人

年　份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劳动力人口	501	653.2	688.5	739.9	744.3	753.6	760.8	768.2	778.8	782.4	786.5
总就业人口	498.7	647.5	680.7	720.9	730.3	737.4	744.3	752.0	758.3	764.0	769.9
城市就业人口	128.1	170.4	190.4	231.5	239.4	247.8	256.4	264.8	273.3	283.1	293.5
国有企业	89.9	103.5	112.6	81	76.4	71.6	68.8	67.1	64.9	64.3	64.2
集体所有制企业[a]	33.2	35.5	31.5	15.0	12.9	11.2	11.7	10.9	10.0	9.4	8.9
外资企业	0.1	0.7	5.1	6.4	6.7	7.6	4.5	5.6	6.9	8.0	9.0
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12.6	14.4	17.5	19.2	20.8
国有控股公司	—	—	—	—	—	—	5.9	6.2	7.0	7.4	7.9
私人投资企业	0.8	6.7	20.6	34	36.6	42.7	25.5	29.9	34.6	39.5	45.8
其余	4.9	23.1	16.9	81.6	91.6	96.4	145.9	151.2	157.0	161.9	165.5
农村地区	370.7	477.1	490.3	489.3	490.9	489.6	487.9	487.2	484.9	480.9	476.4
乡镇企业	69.8	92.7	128.6	128.2	130.9	132.9	135.7	138.7	142.7	146.8	150.9
私人投资企业	—	1.1	4.7	11.4	11.9	14.1	17.5	20.2	23.7	26.3	26.7
个体经营者	305.7	14.9	30.5	29.3	26.3	24.7	22.6	20.7	21.2	21.5	21.9
其　余	288.4	368.4	326.4	320.4	321.8	318	312.1	307.7	297.3	286.3	276.9

“—”指无相关数据。

a 包括合作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四　城市经济中的剩余劳动力

在人口的自然增长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呈持续上升趋势。此外，对主要位于城市地区的国有企业实施的结构改革和减员措施，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虽然新兴的城市私有部门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城市日益增多的劳动力的就业需求。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现在正面临着大规模的显性失业。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登记城市失业率数据显示①，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城市失业率维持在 2.3% ~2.6% 之间，2003 年上升到 4.3%，不过在 2007 年略有下降（为 4%，相当于 860 万失业人口）（见图 1）。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关于各省失业率的数据显示，近几年内地劳动力输出省份（如四川，贵州，云南和宁夏）的失业率普遍比发展迅速的沿海省份（如北京，广东，海南和广西）更高（见表 3）。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官方的数据大大低估了失业水平，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此数据报告系统只适用于 16 ~55 岁的男性及 16 ~45 岁的女性；其次，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仍被视为其原企业的在职员工；再次，对许多失业人员来说，即使他们到当地的就业服务机构登记自己的信息，也不一定会得到帮助，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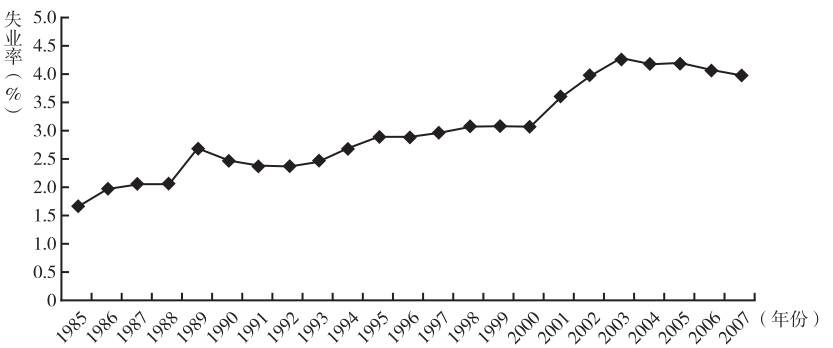

图 1　城市登记失业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的《中国劳动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使用的定义，失业者是拥有城市居住资格证（城市户口），有工作能力但目前失业，愿意在非农产业工作，且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注册的年龄介于 16 ~55 周岁的男性或年龄介于 16 ~45 周岁的女性。

表 3　各省登记失业率（1995～2005 年）

单位：%

年　份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全国平均	2.5	2.9	3.1	3.6	4.0	4.3	4.2	4.2	4.1	4.0
北方省份										
北　京	0.4	0.4	0.8	1.2	1.4	1.4	1.3	2.1	2.0	1.8
天　津	2.7	1.0	3.2	3.6	3.9	3.8	3.8	3.7	3.6	3.6
河　北	1.1	2.2	2.8	3.2	3.6	3.9	4.0	3.9	3.8	3.8
山　西	1.2	1.4	2.2	2.6	3.4	3.0	3.1	3.0	3.2	3.2
内蒙古	3.8	3.8	3.3	3.7	4.1	4.5	4.6	4.3	4.1	4.0
东北省份										
辽　宁	2.2	2.7	3.7	3.2	6.5	6.5	6.5	5.6	5.1	4.3
吉　林	1.9	2.0	3.7	3.1	3.6	4.3	4.2	4.2	4.2	3.9
黑龙江	2.2	2.9	3.3	4.7	4.9	4.2	4.5	4.4	4.4	4.3
东部省份										
上　海	1.5	2.6	3.5		4.8	4.9	4.5	—	4.4	4.2
江　苏	2.4	2.1	3.2	3.6	4.2	4.1	3.8	3.6	3.4	3.2
浙　江	2.2	3.2	3.5	3.7	4.2	4.2	4.1	3.7	3.5	3.3
安　徽	2.8	3.1	3.3	3.7	4.0	4.1	4.2	4.4	4.3	4.1
福　建	2.6	2.6	2.6	3.8	4.2	4.1	4.0	4.0	3.9	3.9
江　西	2.4	2.1	2.9	3.3	3.4	3.6	3.6	3.5	3.6	3.4
山　东	3.2	3.2	3.2	3.3	3.6	3.6	3.4	3.3	3.3	3.2
中部和南方省份										
河　南	3.3	2.6	2.6	2.8	2.9	3.1	3.4	3.5	3.5	3.4
湖　北	1.7	3.1	3.5	4.0	4.3	4.3	4.2	4.3	4.2	4.2
湖　南	2.7	3.8	3.7	4.0	4.0	4.5	4.4	4.3	4.3	4.3
广　东	2.2	2.6	2.5	2.9	3.1	3.6	2.7	2.6	2.6	2.5
广　西	3.9	3.6	3.2	3.5	3.7	3.4	4.1	4.2	4.2	3.8
海　南	3.0	4.2	3.2	3.4	3.1	4.1	3.4	3.6	3.6	3.5
西南省份										
重　庆	—	—	3.5	3.9	4.1	4.4	4.1	4.1	4.0	4.0
四　川	3.7	3.7	4.0	4.3	4.5	4.0	4.4	4.6	4.5	4.2
贵　州	4.1	5.9	3.8	4.0	4.1	4.1	4.1	4.2	4.1	4.0
云　南	2.5	2.9	2.6	3.3	4.0	3.5	4.3	4.2	4.3	4.2
西北省份										
陕　西	2.8	3.5	2.7	3.2	3.3	3.8	3.8	4.2	4.0	4.0
甘　肃	4.9	5.5	2.7	2.8	3.2	4.4	3.4	3.3	3.6	3.3
青　海	5.6	7.4	2.4	3.5	3.6	3.5	3.9	3.9	3.9	3.8
宁　夏	5.4	6.4	4.6	4.4	4.4	3.0	4.5	4.5	4.3	4.3
新　疆	3.0	—	3.8	3.7	3.7	2.9	3.5	3.9	3.9	3.9

“—”指无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的《中国劳动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为他们要么就是没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障金，要么就是即便这些正式的就业机构为他们推介了工作，他们也不具备工作所要求的资历；最后，登记系统会自动取消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农民工）失业人员的登记资格。显而易见，这些数据并未记录大多数“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而这部分人口在城市劳动力中占有很大比例，并且比例仍在不断提高。

以全国人口普查局（NCB）进行的人口变化普查（SPC）数据（此数据是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有关就业/失业的定义，不受以上所述限制的影响）为基础作出估计，1995 年的城市失业率为 3.4%，到 2000 年上升到 7.7%，然而在 2002 年和 2003 年，又有所下降，略高于 6%（Tao，2006：表 8.6）。1996 年 9 月 ~2002 年 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 5 个主要城市（福州，上海，沈阳，西安和武汉）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城市（大约有 1500 万人口）的平均失业率为 8%，其中一些地方高达 14%（Hu，2007）。

五　农村地区的失业情况

1978 年，即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末期，中国有 71% 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到了 1991 年，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总人数高达 3.91 亿，达到中国有史以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最高峰，不过在这之后就开始连续下降。到 2001 年，中国的农村地区有 33% 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并且农村地区 50% 的收入来自非农业生产活动（Cooper，2006）。但是，农业从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始终没有什么变化，且远高于农业生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实际上，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都未能充分就业，据官方统计，超过 1.3 亿的农村人口因缺乏足够的土地或就业机会，而难以维持生计（世界银行，2005）。除了农民未充分就业的情况之外，近些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公开失业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农村的失业人群包括：由于土地被征用而变得无所依靠的农民，被乡镇企业解雇的工人，以及连续的税制改革和地方政府机构重组而导致的下岗农村干部和教师（Tao，2006：527 –528）。

目前没有关于农村地区就业和生产情况的数据，使得对中国农村经济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进行系统的量化困难重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3）在最近做的一项研究中，将中国农业和非农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估计。如果将非农产业的平均生产率作为基准，我们会发现，农村地区的隐性失业人员高达 2.75 亿。但是若

将基准定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水平，如把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 1/3 作为基准，那么农村地区的隐性失业人员只有 1.5 亿。

虽然存在剩余劳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劳动力可以随时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这是因为农民工在决定是否外出打工时会受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一项有关四川省（中国农村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农民进城务工行为的研究发现，即使进城务工所得工资要比待在农村高得多，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民更愿意待在农村地区而不是进城务工（Zhao，1999 年）。这项研究表明，农民不愿意进城务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农民工在迁移过程中及迁居的城市中缺乏安全感；第二，他们将被迫与家人分居两地；第三，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找到适宜的居住条件。而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差，主要是受户籍制度的限制，使他们无法获得永久居住在城市的合法权利。此项研究的这些发现也被随后进行的一系列研究（Zhao，2005）所证实。这些研究发现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即如果没有这些人为的对城乡移民的限制，那么进城务工的农民会更多。

六　工资趋势

在上一部分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仍然存在过剩劳动力的情况。照此看来，中国经济中的工资趋势和工资模式是否会与刘易斯模型预测的一致呢？如果不是，我们要如何解释“中国工资之谜”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资料，我们绘制了城市各经济部门的实际工资走势图（见图 2）。显而易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三种企业（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①）的实际工资几乎停滞不前（见图 2）。自那以后，就呈现出工资全面上涨的趋势。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即以上提供的工资数据表，会使我们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实际面对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产生误解，因为事实上存在产量差异和技能差异（Ranis，1995：514）。此外，这些工资数据将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和国内大公司雇员的工资溢酬也包含在内，因此存在偏差。如果要进行更有意义的分析，我们需要能够反映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或者在城市非正规部

① 集体所有制企业包括各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由乡镇和村经营的企业；由市、县、镇和街道经营的企业。私营公司（其他所有制单位）包括纯粹的本地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国家统计局 20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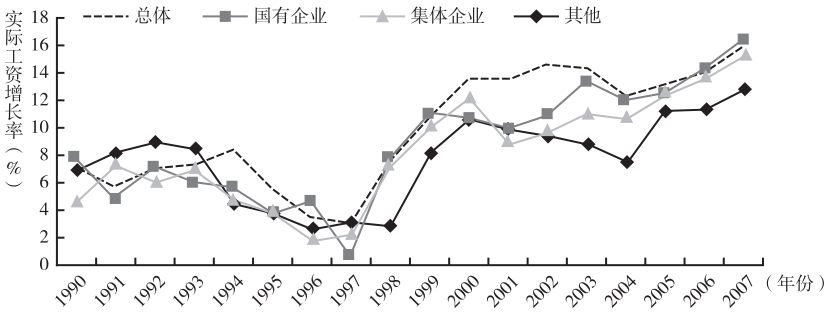

图 2　1986～2005 年间不同所有制企业城市职工实际工资增长[a]
（三年移动平均，集中于当前年度）

a 名义工资减去消费者价格指数（CPI）（1900 年 = 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中国劳动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门务工的农民工的工资的相关数据。我们发现，不只是这些城市工资数据存在偏颇，中国官方的城市工资数据存在的漏洞更为严重，因为这些数据只涵盖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上层。不仅如此，在过去 20 年里，随着向城市迁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多，这个漏洞造成的偏差也变得更为严重。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但是按照不同的所有制类型，通过对省一级官方工资数据的仔细分析确实能看出那些以总体数据为基础的推论的脆弱性。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按所有制分类的企业工资数据。其中，国有企业的工资涨幅要大大超过城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工资设置与劳动力市场状况有更多的相关性）。1995～2007 年期间，国有企业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为 11.2%，而私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7.4% 和 8.3%。国有企业的工资单中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Zhu，2002）。此外，自 90 年代末开始，国有企业职工的薪金和工资会定期大幅度上涨，这也是政府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Rawski，2003）。1995～2007 年期间，非国有性质的企业实际工资增长率（利用就业份额权重从国有企业工资估算得来）为 7.1%，而非报道所称的 11.5%。

数据来源相同的省级城市实际工资数据（包括有现成可用工资数据的省份）见表 4。我们发现，大约自 90 年代中期开始，各省的城市实际工资水平都有明显的上涨。但是这一总体模式并不能确定无疑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紧缩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各个行业的工资普遍都在上涨，这也包括劳动力“过剩”的部门（意味着边际产出为零）。在传统经济中，通常“过

剩”劳动力的工作和收入都是平均分配的，所以他们的薪酬与边际产出无关，而只与平均产出有关。因此，当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现代部门后，他们的工资会比原先有所增加，而这会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即使传统部门仍然存在过剩劳动力。

表 4　各省实际月工资[a]

单位：人民币元，按 1985 年价格计算

年　份	河北	河南	湖南	江苏	四川	上海	安徽	山东	青海	广东	福建	吉林
1985	1075	1015	1059	1135	992	1416	950	1110	1719	1393	1059	1081
1986	1200	1099	1159	1245	1089	1589	1059	1256	1805	1469	1167	1152
1987	1223	1122	1211	1294	1100	1647	1069	1263	1793	1494	1132	1198
1988	1255	1098	1162	1298	1086	1650	1053	1328	1716	1491	1115	1188
1989	1141	1024	1070	1169	1013	1631	989	1220	1545	1453	1081	1091
1990	1258	1140	1169	1271	1091	1716	1084	1321	1587	1630	1242	1119
1991	1299	1199	1196	1337	1168	1796	1095	1342	1597	1847	1344	1135
1992	1411	1315	1268	1539	1217	2068	1170	1426	1607	2064	1458	1186
1993	1514	1389	1351	1734	1248	2274	1248	1532	1676	2245	1581	1233
1994	1703	1486	1408	1880	1310	2405	1346	1710	1872	2465	1773	1387
1995	1709	1563	1383	1921	1285	2540	1425	1725	1834	2506	1843	1455
1996	1743	1604	1365	1969	1311	2673	1456	1777	1924	2591	1986	1646
1997	1814	1644	1387	2078	1354	2785	1525	1857	1947	2702	2209	1674
1998	1885	1866	1422	2390	1418	2940	1699	2052	2184	2903	2501	1952
1999	2318	2063	1536	2692	1756	3398	1850	2308	2488	3267	2807	2176
2000	2576	2327	1661	3015	2025	3613	1971	2639	2768	3939	3066	2443
2001	2876	2639	1981	3484	2349	4162	2219	2958	3464	4500	3526	2670
2002	3339	3055	2259	3970	2685	4540	2635	3385	3797	5184	3925	3056
2003	3644	3525	2488	4582	3024	5163	2948	3699	3950	5780	4186	3350
2004	4038	3769	2754	5128	3256	5565	3446	4070	4297	6211	4386	3611
2005	4320	4062	3059	5551	3407	5867	3809	4442	4562	6386	4490	3908
2006	4751	4515	3378	6310	3753	6498	4357	4871	4854	6991	4747	4248
2007	5174	4847	3745	6946	3984	6927	4954	5338	5217	7350	4916	4588
备注：年均增长率												
1985～1995	4.94	4.55	2.85	5.63	2.74	6.12	4.27	4.68	0.8	6.19	5.88	3.14
1995～2007	9.1	9.6	8.0	10.7	9.1	8.5	10.6	9.2	8.4	8.9	8.2	9.7
1985～2007	7.3	7.4	5.7	8.5	6.4	7.5	7.9	7.2	5.1	7.7	7.2	6.9

a 名义工资减去各省 CPI。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中国劳动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因此更重要的是工资的相对增长速率及相对工资水平的差距。这些数据实际上反映了各省之间工资涨幅的显著差距。快速发展的沿海省份（如广东、上海和广西）的工资增长速度要比内地的劳动力输出省份（如四川、甘肃和青海）快得多。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四川（是目前为止中国最主要的劳动力输出省份）和广东（是目前为止中国发展最快也是吸收劳动力最多的省份）的实际工资就足以验证这一点（见图3）。在80年代后期，这两个省之间的工资差距接近于零，然而在之后的15年里，广东省的工资增长率几乎是四川省的两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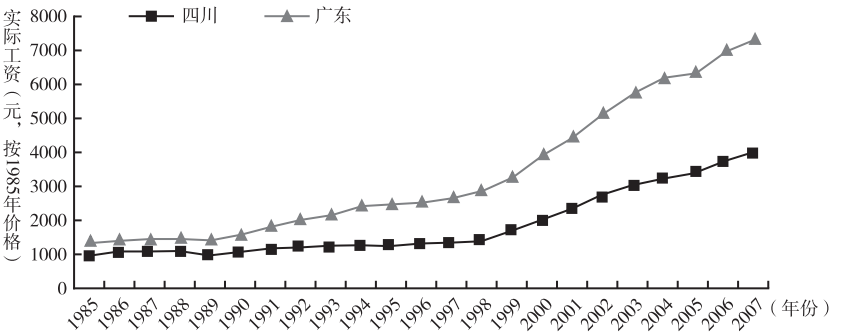

图3　1985～2007年间四川省和广东省实际工资[a]（按1990年价格计算）[b]

a 名义工资（元）按地区CPI（1990年=100）紧缩。

b 年平均增长率——四川省为5.63%（1985～1995年），10.7%（1995～2007年），8.5%（1985～2007年）；广东省为6.19%（1985～1995年），8.9%（1995～2007年），7.7%（1985～2007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中国劳动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利用引自《中国劳动年鉴》的官方数据，研究了城市的工资趋势和工资模式。接下来，我们会利用出自乡镇企业年鉴①的官方数据，来探讨乡镇企业的工资情况。据推测，比起其他类型企业的工资状况，乡镇企业的数据能够更好地反映城市中非技术工人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状况（Banister，2005b，Cooper，2006）。中国几乎所有位于城市地区以外的制造企业和工厂，都属于“乡镇企业”（TVEs）。一些国外制造商及国内制造商也更愿意被归类为农村企业或是乡镇企业，因为它们希望尽量降低成本（如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及其他需要承担的福利义务）和统

① 在中国的国家数据报告体系中，乡镇企业被认为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些企业中工人的工资不包括在城市工资报告数据中。

计要求。大部分的乡镇企业（大约有 94%）位于农村地区（按官方定义），企业主大量雇用那些没有什么技能且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生活的农民工。

我们对 1987～2005 年间城市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人的实际年薪进行了比较（见图 4）。在此期间，乡镇企业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 5.5%，与之相比，城市私营企业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为 6.5%。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表明，这些年里乡镇企业和城市私营企业之间巨大的工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在 2000～2005 年间，乡镇企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仅为城市私营企业的 65%。据省一级数据显示（为简洁起见，在此不附数据表），乡镇企业和城市私营企业之间这种工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现象在发展迅速的沿海省份比内地的劳动力输出省份更为显著（见表 5）。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使得企业可以利用现有体制程序来获得乡镇企业地位，从而使企业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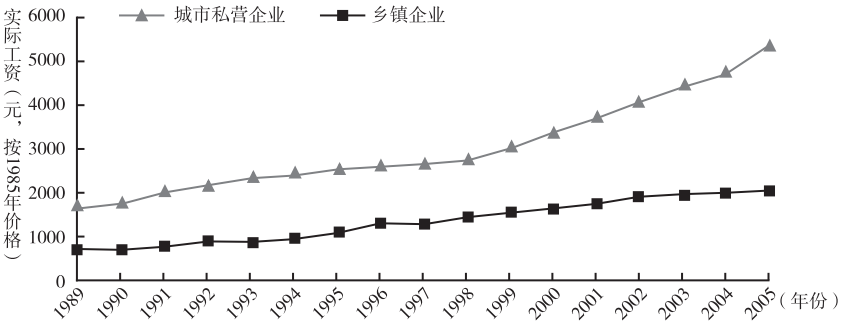

图 4　1989～2005 年间城市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中劳动者实际工资[a]

a 名义工资（元）按地区 CPI 紧缩（1985 年 = 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中国劳动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在对官方数据的分析解读中，可以证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持续的二元结构及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一些为数不多的专注于考察非技术工人和农民工的工资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推论。例如，据一项有关广东省工资走势的研究发现，在 1992～2002 年期间，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几乎未曾增加过（Qin，2003）。在一项对湖北省（主要的劳动力输出省份之一）居民进行的调查中，Zhu（2002 年）发现在不考虑技能差异的情况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是留在农村的农民的两倍。在另一项关于上海流动

表 5　乡镇企业平均工资与城市私营企业平均工资的比值

单位：%

省　份	1994～1995 年[a]	2004～2005 年[a]	省　份	1994～1995 年[a]	2004～2005 年[a]
北　京	69.6	82.0	河　南	102.0	71.0
天　津	85.7	119.6	湖　北	87.9	87.0
河　北	103.3	75.9	湖　南	90.0	74.6
山　西	93.8	106.2	广　东	77.5	73.2
内蒙古	101.2	95.0	广　西	90.0	68.2
辽　宁	101.8	85.4	海　南	81.2	73.8
吉　林	129.9	69.4	四　川	83.0	53.4
黑龙江	115.6	85.5	贵　州	63.2	70.1
上　海	67.3	74.2	云　南	72.5	56.5
江　苏	88.2	87.0	陕　西	82.9	64.8
浙　江	89.4	67.1	甘　肃	56.7	58.7
安　徽	112.4	91.7	青　海	69.6	42.5
福　建	105.9	66.5	宁　夏	61.1	48.1
江　西	107.7	76.1	新　疆	76.5	52.3
山　东	84.2	68.2	全国平均	81.6	74.2

a 两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中国劳动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人口的研究中，Meng 和 Zhang（2001 年）发现，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工资情况，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Meng 和 Bai（2007 年）利用一组特有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制造业的七家大型工厂的职工工资册）考察了非技术工人在 2000～2004 年这 5 年间的工资模式。他们对工资册进行简单的比较后发现，参加调查的工人总体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 6%，相比之下，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 3.5%。一旦考虑了学历、工作经验及其他影响工资水平的变量之后，那么非技术工人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将为负数或趋于零。

七　附加值中的劳动力份额

中国国内制造业的功能性所得分配机制是如何反映中国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情况的呢？图 4 反映的是附加值中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这对我们了解该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总体来看，图中所示的模式与刘易斯预测的模式基本一致，即在过剩劳动力状况下，现代部门中存在着持续的高

利润。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劳工所得报酬占工业总附加值近一半的份额，然而到了 2006 年，这一份额持续下降到 40%。分类数据清楚地表明，国有企业实行的功能性所得分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总工资份额，而国有企业的雇佣做法仍然是由非市场因素主导的。在 1999 年，私营企业（包括在竞争环境中运作的外资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的工资份额占 22%（国有企业是 34%）。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份额却不断下降，到了 2006 年仅为 12%。尽管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来看，中国私营企业的工资份额是相当低的，但事实上，该数据与我们已知的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初期的香港的功能性所得分配机制的情况却是一致的（当时中国内地劳动力大量涌入香港，促进了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Chow 和 Papanek，1981；Athukorala 和 Manning，1999）。近期以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的一些关于中国制造业的业绩水平的研究报告，也证实了如图 5 中反映的私营企业工资份额的情况（Bergsten 等，2006：第三章；Fukao 等，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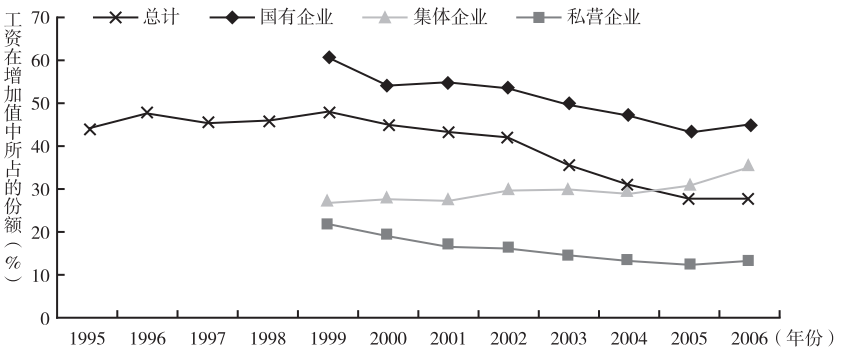

图 5　1995～2007 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中工资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由 CEIM 数据库中数据汇编而成。

显然，劳动力供给的弹性度并非功能性所得分配机制的唯一决定性因素。[①] 例如，在经济转型初期，工资水平相对稳定，只要平均生产率上升

① 产业活动附加值中劳动力的份额（wB/Y，w 是工资比率，B 是产业劳动力规模，Y 是产业附加值）等于实际工资与平均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w/ρ，$\rho = Y/B$ = 平均产业劳动生产率）。

（下降），附加值中劳动力份额就会减少（增加）。如果技术革新的目的是节约劳动力——即通过技术改革来减少劳动力投入——那么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同时，附加值中劳动力占有的份额就会减少，也会造成家庭收入分配出现不公平的格局（Fei 等，1985；Minami，1973）。但在三种所有制企业中，有关劳动力占有的附加值份额的模式并不支持这种推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虽说劳动就业率上升很快，但是私营企业的劳工占有的附加值的份额与国有企业相比要低得多，下降速度也快得多。总之，这些数据似乎表明，尽管一些报告认为存在个别的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但中国目前存在的过剩劳动力状况，仍然对私营的工业部门发展非常有利。

八　结论

在大量的国内过剩劳动力驱动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仍然强劲。非技术工人从农业向更加富有活力的现代经济部门转移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此外，过去 20 年的城乡劳动力迁移和国有企业劳工外流也在城市形成了又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库。

以合理的方式消化吸收这些过剩劳动力对于保持经济的增长势头和减少贫困是至关重要的。这要求进一步改革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限制。同样重要的是避免出台那种在政治上受欢迎，但在经济上起反作用的政策，防止人为地增加雇用工人的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计划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就业保险计划，设立退休金和其他社会保障规定，以及已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可能都还为时尚早。政府可以为穷人提供的最好的社会保障是有利于就业的机会，要达成这一目标，机制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必要的先决条件。

鉴于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引发的环境和基础设施问题，非常有必要再次强调农村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动力向郊区的扩展。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是，中国台湾地区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把加快农村非农业生产活动作为平衡增长过程的一部分。台湾广为宣传的“公平增长”的成果背后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在食品加工行业，它的工业化模式避免了农村非农业经济活动通常（几乎肯定）会有的相对衰落。农村非农业经济活动并没有在与城市工业和服务的竞争中被逐出市场（Ranis，1993）。尽管从长远来看，目前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是合理的，但是农村存在的劳动力过剩的状况要求政府对初等教育投以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Athukorala, P. and Manning, C. 1999, *Structur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ast Asia: Adjusting to labour scar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lbourne and Oxford.

Banister, J. 2005a,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China', *Monthly Labor Review*, July,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pp. 11 – 29.

—— 2005b, 'Manufacturing earnings and compensation in China', *Monthly Labor Review*, August,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pp. 22 – 40.

Basu, K. 1997, *Analyt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Bergsten, C. F., Gill, B., Lardy, N. R. and Mitchell, D. 2006,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Public Affairs, New York.

Brooks, R. and Tao, R. 2003, *China's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and challenges*, IMF Working Paper, no. WP/03/2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Cheng, T. and Selden, M. 1994, 'The origin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 vol. 139, pp. 644 – 68.

Chow, S. C. and Papanek, G. 1981, 'Laissez-faire, growth and equity—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vol. 91, no. 263, pp. 466 – 85.

Cooper, R. N. 2006, *How integrated are Chinese and Indian labour into the world economy?*, *Background paper for Dancing with Giants: China, Ind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Eckstein, A. 1977,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Fei, J. C. H. and Ranis, G. 1997,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Basil Blackwell, Oxford.

Fei, J. C. H., Ohkawa, K. and Ranis, G. 1985,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apan, Korea and Taiwan', in K. Ohkawa, G. Ranis and L. Meissner (eds), *Japan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pp. 35 – 64.

Fields, G. S. 1994, 'Changing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e Republic of Korea, Singapore and Taiwan, Chin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3, pp. 395 – 414.

Fukao, K., Ito, K., Kabe, S., Liu, D. and Takeuchi, F. 2007, *Are Japanese firms failing to catch up in localis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affiliate-level data of Japanese firms and a case study of automobile industry in China*, Draft pape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kyo.

Garnaut, R. and Huang, Y. 2006, 'Continued rapid growth and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development',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pp. 12 – 34.

Garnaut, R. and Ma, G. 1996,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R. Garnaut, G. Shatian and G. Ma (eds),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Hausmann, R., Lim, E. and Spence, M. 2006,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medium-term issues and options, a synthesis report*,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RWP06 – 029,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Hu, A. 2007,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Routledge, London.

Islam, N. and Yokoda, K. 2006, 'An initial look at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in light of the Lewis growth model', *East Asian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7, no. 2, pp. 103 – 32.

Kindleberger, C. P. 1967, *Europe's Postwar Growth: The role of labour supp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Lewis, A. W.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vol. 22, no. 2, pp. 139 – 91.

—— 1958, 'Unlimited labour: further notes', *Manchester School*, vol. 26, no. 1, pp. 1 – 32.

—— 1979, 'Dual economy revisited', Manchester School, vol. 47, no. 3, pp. 211 – 29.

Liang, Z. and Ma, Z. 2004,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new evidence from the 2000 censu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0, no. 3, pp. 467 – 88.

Meng, X. 2000, *Labour Market Reforms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eng, X. and Bai, N. 2007, 'How much have the wages of unskilled workers in China increased: data from seven factories in Guangdong',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pp. 151 – 74.

Meng, X. and Zhang, J. 2001,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China—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9, no. 3, pp. 485 – 504.

Minami, R. 1973, *The Turning Poi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ese experience*, Konokuniya, Tokyo.

—— 1986,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A quantitative study*, Macmillan, London.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2005, *Chain Labour Statistics Yearbook*, China Statistics Press, Beijing.

—— various years, *China Labour Yearbook*, China Statistics Press, Beijing;

—— various year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China Statistics Press, Beijing;

—— various years, *Town and Village Enterprise Yearbook*, China Statistics Press, Beijing.

Naughton, B. 2007, *China's Economy: Transition and growth*,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3, Migration and Labour Markets in Asia 200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Putterman, L. 1992, 'Du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72, no. 6, pp. 712 – 23.

Ranis, G. and Fei, J. C. H. 1975,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the open dualistic

economy: the case of Taiwan and Kore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11, no. 2, pp. 32 – 63.

Ranis, G. 1995, 'Another look at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3, pp. 509 – 34.

Rawski, T. G. 2003, 'Recent development in China's labour economy', in K. Nakagane and T. Kojima (eds), *Restructuring China: Party, society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door*, The Tokyo Bunko, Tokyo, pp. 16 – 47.

Rawski, T. G. and Xiao, W. 2001, 'Symposium on Chinese economic statistics: introduc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3, no. 4, pp. 361 – 72.

Rosenzweig, M. R. 1988, 'Labour market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in H. B. Chenery and T. N. Srinivas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1, North Holland, Amsterdam.

Shi, L. and Sato, H. (eds) 2006, *Unemployment,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Urban China*, Routledge, London.

Siebert, H. 2007, 'China: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new global player', *World Economy*, vol. 30, no. 6, pp. 883 – 922.

Tao, R. 2006, 'The labor marke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velopments and policy challenges i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J. Felipe and R. Hasan (eds), *Labour Markets in Asi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pp. 503 – 58.

World Bank 2005, *China: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orld Bank Report, no. 31973 – CHA,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u, X. and Treiman, D. J. 2004,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 – 1996', *Demography*, vol. 41, no. 2, pp. 363 – 84.

Zhao, Y. 1999,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4, pp. 767 – 82.

Zhao, Z. 2005, 'Migration,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 a survey',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XLIII, no. 2, pp. 285 – 312.

Zhu, N. 2002, 'The impact of income gap on migration decis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3, nos 2 – 3, pp. 210 – 30.

（樊腾飞　译）